

丘逢甲海天孤憤

馮國璣

死易事也吾將復仇

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。扁舟去做鷗夷子，回首河山意黯然。

虎韜豹略且收藏，休說承明執戟郎。至竟虬髯成底事？宮中一炬類咸陽。

捲土重來未可知，江山亦要偉人持。成名豎子知多少，海上誰來建義旗。

從此中原恐陸沈，東周積弱又於今。入山冷眼觀時局，荊棘銅駝感慨深。

英雄退步即神仙，火氣消除道德編。我不神仙聊劍俠，仇頭斬盡再昇天。

亂世圓圓骨肉難，弟兄離別正心酸。奉親且作漁樵隱，到處名山可掛單。

上詩，係台灣革命先進，抗日英雄，丘倉海（逢甲）在乙未（一八九五）領導全體台胞，羣起抗日，奮戰二十餘日後，經親友力勸，隨軍紳士涕泣以請，方始打消了進入深山，結寨固守的計劃，內渡返國。在他整理行裝的時候，匆匆揮筆草就，交給他的妹夫張君珍藏。丘逢甲唯恐他離台後日軍搜出，連累了他的妹夫，特地用「海東遺民」的筆名。然而，這六首詩悲憤低徊，怨恚激昂，誠如丘逢甲的高徒鄒魯所稱譽的：「先生處國破家亡之日，其強毅之氣節，復台之志願，與夫鬱伊無聊，一一托之於詩。故其蒼涼慷慨，有漁陽三拗之音，又如飛兔腰裏，奔放絕足，騰躍紙上！」因此淪日時期的台胞爭相傳誦，至於泣下，六首佳構，不胫而走，成爲台胞吟不絕口的傑作。

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丘逢甲的公子念台，遙返台灣一行，他曾將這六首詩錄下，原稿則仍存張家。一腔忠誠，滿腹悲憤，勢將永為中華民族不朽的篇章。

丘逢甲，字仙根，號逢甲，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，誕生於台灣苗栗，七歲能詩，有神童之譽。他的父親丘潛齋，台中府學廩生。丘逢甲早在十三歲那年便中了秀才，唐景崧時任台灣布政使兼提學使，對丘逢甲極為鐘愛，跟他父親商量，讓丘逢甲住在他的提學使衙門，親自指點他潛心經史，披覽羣籍，使丘逢甲的學業呈一日千里之勢，小小年紀，便以學問淵博知名於世。二十五歲他渡海至福州市城應鄉試，中式舉人，翌年春闈，入京會試又聯捷成二甲進士，授工部主事。丘逢甲不忘唐景崧培植之恩，決心棄官任教，以教育桑梓英才為己任，他援例以親老告歸，回到台灣，迭在衡文書院、台南羅山書院和嘉義崇文書院主講。一旦有空，便閱覽東西翻譯書籍，研究中外大勢。因此他不但成為一位名滿東南的經師，門生桃李，遍佈寶島。而且是舉台人士一致欽重的名學者、大紳士。

丘逢甲的入室弟子鄭魯，曾經形容丘逢甲的天性凌厲雄邁，器宇志趣，往往不知不覺的流露於詞句間。丘逢甲還有一雙慧目，識得天下奇才，豪傑之士。民國紀元前七年（一九〇五，光緒三十一年），當時丘逢甲早已由台灣到廈門轉赴廣州，抵達廣州不久，有一天鄭魯以鄉親的關係前去拜謁這位前輩，談了一會以後，丘鄭二人曾有如下的那段精采對話。

首先是丘逢甲問：

「你是世家子弟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你是富家子弟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麼，你有富貴的親戚嗎？」

「也沒有。」

這時候，丘逢甲情不自禁的低頭喃喃自語：

「貧寒子弟，那會有這樣汪洋浩大的氣度？」接着，又抬起頭來毅然決然的說道：「好，從此你就算是我學生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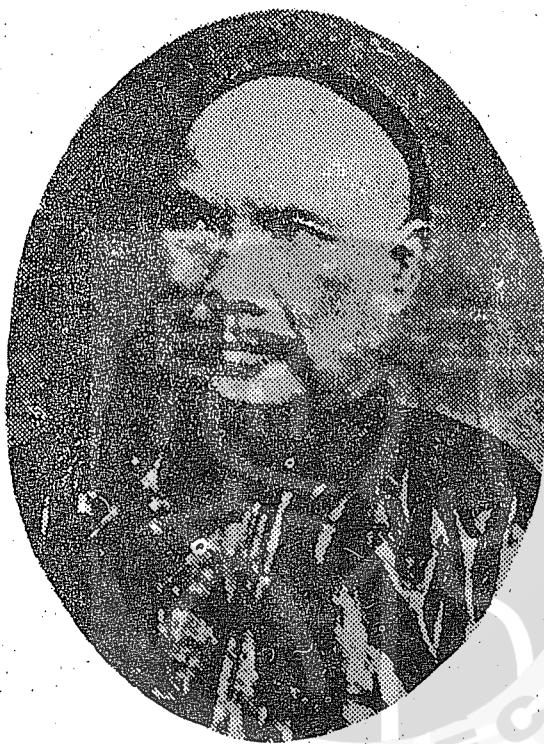
往後鄒魯尤曾不勝欣幸的說過：

「坐談半小時，竟得了一位老師，而這位老師以後對我做事多所提攜，革命多所庇護。人生得人識拔，真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，我則於偶然中得之，一方面當然感激丘先生的知遇，一方面更增強了我的努力。」

鄒魯曾經以韓國志士安重根爲例，說明丘逢甲的偉大。安重根在我國東北哈爾濱手刃日本明治維新策士，前日本首相，時任朝鮮總監的伊藤博文公爵，他的志氣如虹，大義凜然，曾使韓國人士深受感動，三韓志士紛起投身復國運動，經歷無數艱辛，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使韓國獲得獨立自由，屹立東亞，蔚爲反共中堅，安重根毫無疑問的是大韓民族英雄，一代人傑。但是，丘逢甲在台灣高揭義讐，抗日失利，他在台中苦戰數月後，彈盡援絕，伏榛莽中，仍然策劃如何衝出重圍，到台南去和抗法、抗日名將劉永福計議捲土重來，整軍再戰。當日軍大舉入侵臺南，到處搜捕丘逢甲，軍中紳士部屬，家人親友哭着勸他暫避其鋒，徐圖恢復，丘逢甲苦思良久，方才下了決心，他一聲長歎的說：

「死，易事也。吾將效曹沫復魯仇焉！」

倉海念台其何由來



胞台召號，「土守倭拒」書血指刺，後戰午甲。生先甲逢丘雄英族民的灣台據割日暴抗力，

良見倉海君獲大力士，懷鐵錐刺秦始皇於博浪沙的故事。國破家亡的仇恨在他是刻骨銘心，永難忘。丘逢甲在廣東興教育，求人才，兩等小學辦了好幾十所，又曾出長廣府中學，兩廣高等方言學堂。他所用的教職員多半是救國救民的革命黨，尤其在學生中普遍散播革命種籽。

他從台灣輾轉回到廣東故里，在他家的門楣上榜以「念台」的匾額，生了個寧馨兒，取名字也稱「念台」。丘逢甲又自署「倉海君」，號倉海，也是取自張

因此「粵桂革命人士多出其門」。

捨此之外，丘逢甲還極力的利用他的聲望與地位，經常掩護革命黨人的革命行動。廣州新軍之役，黃花岡之役，辛亥起義他都甘冒身家性命危險，盡了很大的力。也正由於這種種因素，使他在民前一年（一九一二）廣州光復後，便榮任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的粵方代表，以及中華民國第一屆參議員，和廣東省教育司司長。

自被迫離台以至民國建立，丘逢甲平居很少展顏，懷念台灣的詩作則不下百首之多。唯有他擔任粵方代表赴南京，展謁明孝陵。他不但揚眉吐氣，尚且拊掌大快，當時便作了一首即興詩說：

「鬱鬱鍾山紫氣騰，中華民族此重興，江山一統看新定，大纛鳴笳謁孝陵。」

非常不幸，丘逢甲在參議院猶未揭幕以前便得了病，由他的親友林魯傳等護送南返，到鎮平自宅，旋即逝世。時在民國元年，得年四十九歲。

他的入室弟子鄒魯在悼念他時有云：「氣節之爲物，有如日月麗天，即使被雲霧掩遮於一時，最後終能破晦擣嗜，大放光明。我們以氣節的明晦，來看國家民族的興亡，必定屢試不爽。一國一族只要有人有氣節，雖一時危亡亦必能俟時光復，少康一成一旅可以中興，申包胥七日哭秦竟能復楚，歷史上像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。如丘逢甲先生的『死，易事也』，留此未死之身，孕育後起之革命，其心苦，其行尤難」，鄒魯又說：「不得已而洩之於詩者，此吾師丘倉海先生所以爲世崇拜而不已也。」顯然這又是一個彰明昭著的歷史事例。瀕死遺言墳墓須南向，以示不忘台灣的丘逢甲先生，即使在九泉之下，終亦盼望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台灣重又回到祖國的懷抱。

丘逢甲畢生事跡，最轟轟烈烈的一幕，當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割台，號召台胞紛起抗日，那

是我國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页，然而，細述根由，仍需自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之戰說起。

光緒二十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，東亞風雲緊急，日本明治天皇新練的陸海兩軍，公然在朝鮮挑起中日大戰，佔據朝鮮京城，生致韓王李熙。朝鮮本來是中國的藩屬，清廷當然不能不加以救援。於是派出水陸兩師，兼程併進，一面積極部署台灣和澎湖的防務，防止日軍趁機入侵。當時的閩浙總督譚鍾麟，正是前國民政府主席，行政院長譚延闔先生的封翁。邵友濂在當台灣巡撫，現在台北市的中山堂，便是台灣巡撫衙門的所在地，那兒是一省的軍政重心。中山堂前的第十信用合作社，原先是主管一省行政的布政使署，台北府衙則建在現今的開封街一段和漢口街一段之間，恰好是全城的中心點。新任的台北知府是陳文驥，順天府大興縣人，進士出身，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甲戌翰林，光緒十九年（一八九三）蒞任。中日甲午之戰既起，六月下旬，清廷復命我國民族英雄，揚威安南的黑旗將軍劉永福，酌帶兵員來台，幫同邵友濂辦理防務，那時候，劉永福將軍的正式官銜是廣東南澳鎮總兵。跟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檄調來台的，還有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的一支勁旅，當時擔任台灣布政使的又是曾經大敗法軍於安南宣光，素有知兵之稱的吏部主事唐景崧。所以，在甲午戰敗，乙未割台之前，台灣全島正是名將紛至，大軍雲集，台灣同胞無不額手稱慶，欣喜若狂。沒有人想到昏庸頗預的清廷，竟會割讓台灣，棄數百萬台灣同胞於不顧。

台灣紳民誓不降敵

當朝鮮、黃海敗耗傳來，台灣整軍經武，積極備戰，英明幹練的台北知府陳文驥，延見時為舉人的高選鋒（現台北市警局副局長高松壽之令祖），請他助一臂之力，他正式下令，任命高選鋒負責辦理大加蚋保二十七

莊團練，設台北籌防局於上牌一莊（今之台北工專右側鐵路附近），從這一天起，台北民衆紛紛加入團練，訓練成師，抵禦外寇。而台北籌防局自此也成爲士紳民衆，頻頻集議，籌商戰守大計的會議場所，與巡撫衙門、台北府衙，同爲台胞抗日的發號司令處，其中最主要的人物，厥爲工部主事丘逢甲。

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五日，黑旗將軍劉永福，和他的兒子劉世良，親率粵勇六營，搭乘威靖、駕時兩輪，從汕頭駛抵臺南，就地建築營寨砲壘駐守。這時候劉永福的職銜是「欽差協辦全台軍務事宜」，日本方面聽說劉永福協辦台灣防務，忌憚他的威名，曾由某大吏遣使游說，只要劉永福率部內渡，日本願釐巨金爲酬。劉永福峻然拒絕日本人的無理要求，消息傳到台灣各處，使三百萬台灣同胞更其歡欣鼓舞，認爲擊退日軍，確保台灣實有莫大的把握。就在這一段時期，主持全台大局的滿清大吏，人事有了變化，由台澎兵備道陞任台灣布政使的唐景崧，彈劾巡撫邵友濂辦理台灣防務不善，邵友濂本來就是文人，他自己也覺得軍事並非其所長，因此他密奏清廷，請求內調。清廷便順水推舟，調邵友濂爲湖南巡撫，而以唐景崧署理台灣巡撫兼督辦全台軍務事宜，將台灣的軍政大權，置於唐景崧一人之手。

當時，台灣北部防守向以滬尾（現在的淡水）爲重鎮，守滬尾的是武職中最高的提督軍門，然而滬尾守將却在唐景崧署理巡撫，節制全台軍務的兩個月間，三度易將。由提督李本清跟唐景崧交惡，自動求去爲始，先代之以蔡高會，又易之以廖得勝。再則，清軍在台係以前任巡撫劉銘傳攜來的淮軍中之銘軍爲主力，銘軍在台雖有拒法抗日的兩次光榮戰績，可是他們駐台歷有年所，早已師老兵疲。而且那般驕兵悍將，亡命之徒，也斷非「知兵」如唐景崧者所可統率駕馭，何況還有隨淮軍來台轉入民間的會黨惡勢力。例如「李文奎之變」，以一名黨羽甚多的巡撫衙門親兵，被革後爲洩私忿，竟然攔路搶刦唐景崧的女婿，砍殺副將，刀傷差官，擄衆大

閩巡撫衙門，跟楊歧珍提督親率人援的官兵對陣轟擊，連傷台北居民十餘人。事平後唐景崧非但不能以斷然手段懲治亂首，反而怕他人多勢衆，命李文奎募勇一營駐紮基隆，於是將士離心，軍紀鬆弛，兵驕日盛，越發的無從抑制了。

台北自「李文奎之變」後，開始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而日本軍艦進攻澎湖，加以佔領，海道中梗之外，購自外國的大批軍械又復陷敵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四月十四日，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所談判的馬關和約簽訂，台灣割讓日本，噩耗傳來，三百萬同胞無不痛哭流涕。四月二十六日台灣巡撫唐景崧招攬四方豪傑，或任戰爭，或籌餉需，共支危局的札飭中，即會有如下之形容：

「照得日本欺凌中國，和款內索割台灣一省，尤不得公法之平，台灣紳民，誓不服從，悲慘萬狀！相約死守，以待戰機。……」

在丘逢甲的領導之下，台胞誓死抗日保台步步進入高潮，首先是台灣舉人以會試在即為詞，上書清廷請罷割讓台灣之議。這一封台灣舉人公車上書的電報打到北京後，有如石沉大海，始終得不到清廷的答覆。反倒是令人驚駭萬狀的壞消息，如雪片般飛來，李鴻章已經跟伊藤博文約定，馬關和約定四月十四日簽字，清廷躊躇瞻顧，却又有兵部侍郎孫毓汶、吏部右侍郎徐用儀，奏以停戰日期已滿，請光緒皇帝立刻畫押於和約之上。同日北京城裏又有密電來到，據說馬關和約如果能够再展緩十天畫押，各國將共同出面阻止清廷割讓台灣。消息之來使台灣同胞悲憤莫名，激動情緒如鼎之沸。台北、台南的大街小巷，到處貼滿了痛罵孫毓汶、徐用儀是出賣台灣大漢奸的告白，言詞之激越，恨不能寢其皮而食其肉！——孫毓汶、徐用儀後來果然被台灣在京官員參奏黜退。

衆情激憤怒潮澎湃

台北籌防局成爲台胞激烈反對割讓台灣的神經中樞，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、候補道林朝棟、和台北人內閣中書教諭陳儒林，一連多日不眠不休，都在台北籌防局裏哭紅了眼睛朝夕聚議。籌防局裏裏外外，擠滿了義憤填膺，同仇敵愾的人羣。直到四月二十一日，京中文來噩耗，馬關和約業已簽字，割讓台灣已成定局。在這一瞬間，全台灣的官紳士庶放聲大哭，悲呼哀號聲震天地。大家抱頭痛哭一場過後，議決立即電奏北京朝廷，電文僅祇十六個字：

「台灣士民，義不臣倭，願爲島國，永戴聖清！」

同日，又飛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、南洋大臣、閩浙總督、福建布政使，迫切陳詞，爲民請命？這是台灣的一頁珍貴文獻：

「敬稟者：台灣屬倭，萬民不服！迭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，而事難挽回，如赤子之失父母也，悲慘曷極！伏查台灣爲朝廷棄地，百姓無依，唯有死守，據爲島國，遙戴皇室，爲南洋屏蔽。惟須有人統率，衆議堅留唐撫台仍理台事，並劉鎮永福鎮守台南。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割斷，台灣應作何處置，再送唐撫入京，劉鎮同任。台民此舉，無法懲戴皇清，以圖固守，以待轉機，情形萬緊，伏乞代爲電奏。」

飛電去後，台灣紳民目不交睫的一連等了幾天，由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出面答覆的電文到了。大意是說和約已於四月十八日簽定，在清廷來說這也是情勢所迫，「勉從其議」，因爲不簽和約的話，「一則戰不可恃，二則進迫京師，利害攸關，視台爲重」，「台無接濟，一拂其情，勢必全力併攻，徒損生靈，終歸漏陷。」

福曾一連幾次主動提起，他要移駐台北，幫忙唐景崧切實整頓，重新部署。可是唐景崧却一再陳言台南地勢險要，非劉永福親自鎮攝不可，花言巧語把黑旗將軍的自動請纓給支吾過去。尤其不該的是當劉永福無可奈何，廢然返台南以後，唐景崧竟以一道電令把他調到距離台南猶有八天行程的恆春鎮。劉永福再到恆春時唐景崧已兵敗如山倒，閭家逃離台北內渡了。

當台灣紳民凜於國家民族大義，誓不服倭，義師之起真是如火如荼，轟轟烈烈。光是負責守台中的遜清進士、工部主事丘逢甲先生，他傾個人之力再加上戚友鄉黨的資助，居然在短短的數日之間，募集了衆達三十五營的義軍。還有自動投効大加蚋保二十七莊團練的一名哨官吳得福，原先是個替人祛病禳災的道士，曾在基隆力戰不屈被日軍所俘，逃脫以後他矢志規復業已淪陷的台北府城。高選鋒命他到大溪莊（今之大安區）去跟民軍同志黃賜切取聯絡，他們兩個人一聲號召就糾合了抗日志士三千餘。吳得福和他的同志在神前歃血爲盟，竟至不惜手刃他的五歲幼兒作犧牲。後來由於日軍遍城大索，黃得福先生和他的同志九人不幸被捕，黃先生在臨刑前自戕而死，他的太太也引刀自刃，殉夫殉國。凡此台灣紳民抗日情緒之高昂，犧牲之慘烈，豈止驚天地泣鬼神而已。

乙未日軍據台，竟然節節推進，據有全台，那是明治、伊藤和樺山資紀吉星高照，衛青不敗由天幸。否則，以台灣地勢之險要，台胞抵禦外侮之壯烈，毀家紓難，寸土必爭，日本決無順利佔領全台之可能。而所謂「天幸」也者，無他，實爲國際情勢微妙，頽頹清廷積弱，唐景崧舉止失措，三項因素有以致之。

乙未割台，恰在德法俄三國干涉還遼之後，日本蕞爾小國，方始在遠東崛起，豈有不畏列強國家起而干涉的道理？此所以，一再聲明仍奉大清正朔的台灣民主國成立之初，唐景崧順應輿情，採納衆議，他以候補道陳

季同爲外務卿，十萬火急的向英、法、俄三國籲求國際道義的支援。可是，偏偏當時英國正有置身局外的聲明，萬不能自食其言，毅然爲中國之助。法國方在馬達加斯加島用兵，對東方事務，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俄國積極經營遼東，他自忖對台灣鞭長莫及，因而也就無暇一顧。

澳底登陸獅球苦戰

日本却把國際情勢，中國處境全都摸了個一清二楚，因此他們不惜在攫奪三轉之後，再悍然不顧一切的用兵台灣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四月十八日馬關和約簽字，當月底，明治天皇即以海軍大將、子爵樺山資紀爲統帥，率領軍艦十五艘，載運步兵四個大隊，騎兵一大隊、工兵一中隊，及一個衛生隊之半。他麾下的大將有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、旅團長川村少將。五月初六（西曆五月二十八日），這一支艦隊首尾相啣，聲勢浩蕩的駛抵北部三貂海，由力疾前前往的李傳相李鴻章長子，二品頂戴出使大臣李經方，代表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方。就在這一天，日軍統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親率五千名日軍，從三貂角的澳底登陸台灣。

當時清軍置重兵於基隆、滬尾（淡水）兩處重地，以爲日軍必定會從這兩處要塞登陸進攻，幾乎沒有人想到三貂角澳底港灣的深度可以泊巨艦。唯有樺山資紀早已偵知三貂澳底港深可泊巨艦，五月初六樺山親率工兵、步兵各一中隊登陸，大隊人馬繼之。當地僅有銘軍統領張兆連、分統官副將曾蘭亭率勇三營迎戰。我軍守澳底的兵力不多，力戰一小時半後澳底棄守，防兵潰散。唐景崧乃命吳國華往守三貂嶺，吳原是有司懸賞緝拿在案的賭徒、無賴，居然被唐景崧誤信其爲「大俠」，命他掣銀二十萬兩赴廣東募勇一萬，分乘漁船奪回澎湖，倘使得手便乘勝進襲日本本土。結果吳國華祇募到兩千餘人逕來台灣，途中遇風停泊鹿港，被劉永福截留了其中

大部，吳國華便帶了幾百人抵達台北。唐景崧命他守獅球嶺和三貂嶺。吳國華在小楚坑猝然遇見一支日軍斥堠隊，正在測度地形繪製地圖，他會同當地土勇施予襲擊，擊斃佩三畫肩章的日本軍官一名，餘衆拋下兵器翻山越嶺而逃。這時候剛好有一名統領包幹臣帶勇三百名赴三貂嶺助戰，看到路旁日本軍官的屍首，就要割下首級回去請功。爲當地土勇所阻止，包幹臣一怒之下誣指土勇爲漢奸，喝令綁下就地正法。當時吳國華率隊已到三貂嶺上，正在等待帳篷紮營，聞報包幹臣搶奪首級，他竟不顧大局，立刻撤隊急馳下嶺。包幹臣見吳國華到時拔隊就走，吳國華則啞尾急追，這兩位守將祇爲了爭功請賞，遽然撤兵，乃使三貂嶺門戶洞開，於是當夜四更樺山資紀大將便冒雨攀登，將三貂嶺予以佔領。初九分兵兩路，猛撲瑞芳、九份。台灣北部守將張兆連足趾受傷。十一日，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親率大軍猛攻基隆，張兆連遁台北，基隆失陷。同日，日軍在電閃雷鳴，大雨如注中仰攻北部天險獅球嶺。激戰三小時，義軍潰敗，獅球嶺亦淪於日軍之手。

五月十二日，陽曆六月四日，錫口（松山）和土坤頭一線，尙有大加蚋保二十七莊民軍，據險扼守，並且慰勞瑞芳、基隆、獅球嶺、九份等處潰退的粵勇士勇、大批難民。義軍領袖深知獅球嶺失守，台北北面的屏障已失，錫口、土坤頭間地勢平坦，防守極爲困難，但是當時民軍士氣高昂，爭欲與日軍決一死戰。不幸，五月十一日獅球嶺失陷，五月十二日台北就發生了粵勇搶刦巡撫衙門內庫餉銀的驚人事件。那一夜之間，台北城裏火光燭天，喊聲震地，粵勇志在搶刦，民軍急起攔阻，雙方因而發生衝突，再加上火藥庫忽然爆炸，台北城裏直鬧得天崩地拆，鬼哭神嚎。軍民惶亂，自相踐踏，官署街市，一概糜爛。唐景崧逃到了滬尾（淡水）德商忌利士洋行，第二天他便乘鴨打洋輪內渡。

從此以後，自台北到新竹，粵勇遍處騷擾，和土勇相互斫殺。台灣北部抗日防務，終於在一片大亂中土崩

瓦解。五月十九日，日本北白川宮親王率部進駐台北，二十一日，日軍沿鐵路線繼續向南推展。

愛國壯舉永垂不朽

三貂嶺、瑞芳、基隆、台北之失，除了日軍強勁，裝備亦復優於我方。可是我軍敗得如此突迅，完全是我爲唐景崧所招募的粵勇，份子複雜，軍紀渙散，和當地的民軍，又復各自爲戰，積積不能相容。粵勇應募來台，多半是爲了升官發財，跟民軍保衛桑梓，誓不與日人共戴一天的同仇敵愾，自不能同日而語。所以，粵勇潰散，民軍猶仍在大亂之餘，遍地瘡痍之中重整軍旅，繼續抗戰。大加蚋保二十七莊民軍，誓死不屈，紛紛的以碉堡、竹園爲掩蔽，機動出擊，施行游擊戰術，殺傷日軍極夥。例如二十七莊之一的五分埔莊農民詹振，直到乙未割台之役翌年，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六）春三月，當各路義軍進攻台北一役時，猶曾率領所部二百名襲擊錫口（今之松山），擊斃日軍不少，並且破壞鐵路車站，控制鐵路，將錫口鎮光復。義軍首領便以這一支武力爲基礎，發動各莊義軍經常襲擊南港、興雅莊（今之三張犁），上埤頭莊一帶的日本守備部隊。義軍熟悉地理，便於呼應聯絡，所以行動飄忽，神出鬼沒，使日軍防不勝防，唯有組成厚結兵力的「討伐隊」，日夜搜索台北大加蚋堡十七莊。於是義軍領袖率部，改以北山一帶爲根據地。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五月八日深夜，義軍首領詹振捲土重來，糾集他的堂親詹番，和陳秋菊、簡大獅等，指揮義軍一千餘人反攻台北城。他們一直攻到了大稻埕，方始被強大的日軍擊退。詹振在退土坪頭的時候中流彈而死，遺屍道旁。

光緒二十三年反攻台北之役失敗後，台北義軍受了很大的挫折，但是後起者仍然前仆後繼，奮戰不懈，一直到台北淪陷三四四年後，日軍尙無力控制台北附近的鄉鎮。不過從光緒二十三年起，日本派駐台灣的總督樺山

資紀，開始了他的懷柔政策，百計矯撫台灣的著名士紳，以及抗日份子。

日軍進犯台北時，丘逢甲正率部扼守台中，聞耗，他曾立率義軍赴援，可是，剛剛走在半路上，即已聽說日軍已陷新竹，俄而台北亦告易手，變兵縱火焚掠全城，唐景崧行蹤不明，敗耗相繼傳到，丘逢甲一手組成的義軍調知已無可爲，相率散去。

丘逢甲滿腔孤憤，進退維谷，入山固守又被親友部屬所阻，迫不得已，唯有洒淚內渡，徐圖光復了。驅逐暴日，光復台灣的深切願望，却在他逝世後三十三年，由抗戰勝利而終告實現。丘逢甲的愛國之舉，誠然是不平凡的，千秋萬世，必將永爲世人所景仰。